



运动歼灭战的范例——莱芜战役

□ 夏东旭



初步定下决心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战场情况，并根据敌情变化适时调整决心，正确处理了“打”和“走”的关系，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

示形于南、决战于北。此次战役，华野主要领导人陈毅和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办法迷惑敌人。一是在主力撤出临沂北进之前，全军原地休整，对外作出必打南面之敌的态势，并派华野二纵南下，先歼灭反复无常的叛军郝鹏举部，同时令渤海军区部队停止对当面之敌的骚扰，以示“决战南线”之意；二是在主力北移之后，严密封锁消息，并在临沂以南构筑三线阵地，摆出决战架势，留下一部分兵力伪装华野主力，在南线积极阻击敌人，以示“决战南线”之形；三是我军主动放弃临沂，同时派遣地方武装和民兵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船只，声音与晋察冀豫野战军会合，造成我军作战不力，疲惫不堪的假象，以示“失利西退”之举。敌先是以为我固守临沂，决战南线，命令北线之敌快速前进，后又错误地判断我将放弃山东，西逃渡黄河，复令龟缩莱芜的李仙洲集团再次南下，使敌处于完全被动状态。我军在定下歼灭北线之敌的决心后，迅即整备全军，夜行晓宿，隐蔽急行，迷惑敌人，当我大军突然出现在北战场时，敌仓促应战，被我全歼。

集中兵力、运动歼敌。歼灭战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为了歼灭敌人，必须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次战役，我军始终贯彻和掌握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敌人的原则。2月11日，华野首长根据战场实际，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将原在鲁中、鲁南、渤海、胶东的主力部队集中于待机位置，并令其抓紧时间调整。当北线战场具备良好的战机时，迅速移兵北上，除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牵制南线各路敌军外，首先集中53个团的兵力，解决第73军和第12军1个师，而后再转移兵力，解决驻守新泰的第46师，并向胶济线进攻。2月19日，我军在侦察得知敌第77师南下归建的情况后，即先以2个纵队4个师的兵力，进至和庄附近地区隐蔽，乘敌在运动中一举将其歼灭。并于2月20日晚发起全线进攻，集中了21个师的优势兵力对付李仙洲集团的7个师，在歼灭李仙洲集团时，同样采取了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战法。而后转用兵力，集中6个纵队、16个师的优势兵力，于22日在莱芜以北设伏，布成袋形阵地。23日，向北突围之敌进入了我预设的“口袋”后，我即以拦头断尾、两翼猛烈出击的手段，迅速将该敌歼灭于运动中。粟裕评价道：“四五万人拥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实践证明，集中优势兵力，以伏击手段，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就能保障战役的速度和全胜，使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靠群众、支援有力。“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此次战役，我军充分利用在山东解放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动员鲁中人民支持参加后勤工作，大力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民兵团参战，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充分展示了人民战争的鲜明特色。在山东解放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广泛号召下，动员支援服务前线的民工就达60万，为我军几十万的作战人员供应粮草、运送武器装备弹药和伤病员，及时抢修道路等。积极组织地方民兵团和侦察袭扰分队，协助作战部队侦测敌情动向，封锁我军消息。广泛开展敌后骚扰破坏、破坏道路交通，同时对敌散发宣传手册，宣讲我党我军政策、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有力地保障了此次战役的胜利。

全面深入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 姜平



军方略不动摇，持续深入抓作风，推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使我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牢牢把握内涵意蕴

习近平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目标、任务、途径等内容，必须深入学习领会，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深刻内涵意蕴。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灌注部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围绕“8个明确”“14个坚持”引导官兵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决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进攻仗主动仗，积极占领主阵地，切实掌握话语权，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持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循，作为最高政

治纪律来严守。认真落实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坚持全面从严治军。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推动管党治军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公道正派用人、严以追究问责，做到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持续推进正风反腐，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搞得更加坚强有力。

坚持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政治工作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工作。培育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深刻揭示了培养合格革命军人的内在规律，与我们党培养合格革命军人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坚持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凝心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抓好舆论引导、教育培养、实践养成等工作，切实让这一价值观成为官兵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始终用光荣传统、党史国史军史深化革命精神教育，用实战化军事训练砥砺淬打，切实把培养人、塑造人贯穿于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全面融入部队建设实践

深化理论武装。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实现了党的军

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官兵，引导官兵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夯实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政治根基。要贯彻“关键要实”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用一致，坚持领导带头，务求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在认清使命、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在推动工作、见诸行动上取得实效。

聚焦主责主业。要始终抓好思想引领，用强军目标激发、用严峻形势警醒、用优良传统感召，大力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激发官兵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志投入练兵备战。要把战斗力标准牢固立起来，自觉破除脱离实战的思想观念，彻底清理与战斗力标准背道而驰的陈规陋习，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实战化训练，依托部队检验拉动和演训活动，在实战化军事训练中掀起群众性练兵比武热潮，促进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

着力解决问题。问题是时代的聲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当前，意识形态、信息网络、深化改革、思想作风等问题持续凸显，对坚持政治建军原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须直面矛盾问题，继承和发扬革命本色，切实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研究解决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发挥不够、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等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中为推动全军重整行装再出发提供有利政治条件。

推动创新发展。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政治工作。要研究把握信息网络时代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用好用活网络平台，运用鲜活时代元素，推动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融合，推动政治工作方法手段、运行模式现代化。要深入细致研究官兵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需求，因人而异有的放矢做好工作。要积极适应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新要求，把部队、社会、家庭衔接起来，把军内军外、网上网下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军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

（作者系北部战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少将）

军事理论

古典兵学与中国军事传统

□ 董伟 丁涛

中国古典兵学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检验，蕴藏着丰富的军事理论实践经验。随着时代分合攻守之势变迁，逐步凝练出言兵用武的基本原则及普遍追求，展现出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

贵和慎战

中国传统治世智慧多与上古“圣王之治”参照比对，擅长从生死的根本问题看待文武关系，尤其以“贵和”作为战略指导，采取审慎理性的态度看待内外战争，这也是古典兵学思想重要的内涵品质。“贵和”首先是“贵生”，“慎战”则基于“兵凶战危”的普遍认同。同时，善于从战争起源及属性，肯定用武的必然性合理性，形成了早期朴素的看法，以至后世对战争根本问题的讨论实践，基本围绕“诛暴乱”“禁不义”“平乱除害”“以战止战”等主题展开。唐太宗在《帝范·阅武篇》中更是将武器装备意义上升到保持全民国防意识及状态的高度来理解，指出“好战则民凋”“亡战则民殆”。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对战争的定义，往往显得异常理性，极力反对穷兵黩武，更不主张偃兵息武，而是将道义挺在前面、以“贵和”为根本追求。自上古五帝时已自觉将“亲睦九族”“协和万邦”与用兵挂钩，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武王

伐纣以“吊民伐罪”为感召，目标直指推翻殷商暴政，赢得了“八百诸侯”追随及商民的同情，致使殷商军队“临阵倒戈”，最终开辟政治昌明、格局宽大、和合天下的新局面。

战法本于政胜

有关政治与军事之间关系的讨论实践，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是由来已久，“文武相资”“文武并用”是基本主张，很早就认识到政治是军事的根本、军事是政治的另一种继续，以及军事服务服从政治的道理。《商君书·战法第十》明确提出“凡战法本于政胜”的概念，认为政治上的良善是赢取战争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司马法·仁本》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其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直接点出了“武功”是实现“文治”必不可少的手段；《尉缭子·兵令第二十三》围绕用兵作战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文里武表的主张，将军事手段作为达到军事目标的骨干，而以政治眼光作为考察利害、识别安危的根本。另一方面，古代帝王在论述文武关系时，往往从实践层面高度一致地认同文武并行并开，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阅武篇”“崇文篇”结语中明确“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明成祖朱棣也提出“文武并用，久长之术”。

智慧用兵

战争是严酷的，事关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武力的运用不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智谋的角逐，强调“知彼知己”、重视“先计后战”、主张“伐谋伐交”、追求“全胜”等原则，抓住了如何高效使用武力的关键，也明确提出反对“暴虎馑冯”式的匹夫之勇。《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庙算”在确保战胜的重要性，并将其量化为“五事七计”，点出了需要着重关注的敌我对比事项；不仅有原则性的阐释，也有涉及战争要素的展开论述，《虎铃经·先谋第十五》直接明确了“用兵之法，先谋为本”，强调把握不同的作战意图所对应的要素，提出出征必先安民、攻伐必先通粮道、布阵必先争取地形优势、胜敌必先内部团结、坚守必先有力量贮备、提升战力必要严明赏罚等原则。此外，还倡导“伐谋”“伐交”，尽力避免“伐兵”“攻城”这种高成本使用武力的情况出现。如楚汉争霸时期，韩信“背水列阵”并灭赵国后，意欲继续进击燕国，在李左车“按甲休兵”建议下，采取积极举措稳定赵国，最终成功迫使燕国不战而降。

注重大一统

历史上很早就以“道义”“天下”“和合”等价值追求来规约战争，建立

军事思想